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丁
平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20TH CENTURY'S EXTRA-
TERRITORIAL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张西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
历史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20TH CENTURY'S EXTRA-
TERRITORIAL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张西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张西平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 7 - 5141 - 5639 - 3

I. ①2… II. ①张… III. ①中华文华 - 文化史 - 研究 - 古代
②中华文化 - 文化传播 - 研究 IV. ①K220. 3②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8312 号

责任编辑: 刘 莎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邱 天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张西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9.25 印张 800000 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639 - 3 定价: 9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经川洪世

继任前东

贺教育部

毛大政问项目

及呈书版

李阳村  有八

课题组主要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超	王苏娜	严绍璁	苏莹莹
李 真	李雪涛	佟加蒙	何碧玉 (法)
柳若梅	顾 钧	薛庆国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 任	孔和平	罗志荣			
委 员	郭兆旭	吕 萍	唐俊南	安 远	
	文远怀	张 虹	谢 锐	解 丹	
	刘 茜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自2003年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计划。这是教育部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的组织方式，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进行，每年评审立项约40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30万~80万元。项目研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联合研究，鼓励吸收国内外专家共同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几年来，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集合高校优秀研究团队和顶尖人才，团结协作，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壮大了科研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此做出重要批示，指出重大攻关项目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影响广泛，成效显著；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紧密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优化资源，突出重点，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这个重要批示，既充分肯定了重大攻关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又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殷切希望。

作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秉持以管理创新

服务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遴选、评审立项、组织开题、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鉴定的全过程管理，逐渐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办法，努力将重大攻关项目打造成学术精品工程。我们将项目最终成果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统一组织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精心组织编辑力量，努力铸造出版精品。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经时济世 继往开来——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书名，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言

严绍璦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及学术意义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递，历史古远、区域宽广，曾经在亚欧广袤的区域引发了程度不等的对‘中华文化’的憧憬、热忱和思考，在文化学术史上被称之为‘汉学’的‘学问’由此而诞生……无论是在‘汉学时代’还是进入了‘中国学时代’，就这一学问涉及的地域之广阔，历史之悠久，积累的智慧与资料的丰厚，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上考察，它始终是一门与世界文明密切相关联的‘大学问’，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的历史性价值和意义。”^①

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渐成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术领域、投身这个学术领域，一个长期冷僻的学术领域开始受到重视。回顾学术发展的历程，这个领域的逐步拓展，并日益扩大是从比较文学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这个研究领域早在民国期间就已经被学者所关注。陈铨先生 1934 年写下的《中德文学研究》^②，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了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范存忠先生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钟书先生在牛津的学位论文

^① 严绍璦：《序说》，见《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79～200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中德文学研究》是陈铨 1934 年在德国克尔大学撰写的文学博士论文。陈铨于 1934 年 2 月回国之后，他把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于 1934～1935 年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分 4 期连载完毕，题名为《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台湾学生书局 1971 年再版），1936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题书名为《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曾于 1997 年再版）。

《17、18 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全面介绍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朱谦之先生的《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①, 从历史和哲学角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做了历史和哲学的研究。

1932 年朱滋萃所翻译的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② 则开启了民国期间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的系统研究。这种对西方汉学学术史的研究也是清末民初, 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研究转向用西方学术体系重塑中国学术的一个必然要求。在民国期间, 西方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前贤大师们的互动已经非常频繁。^③ 师从葛兰言的杨堃回到国内已经展开社会学的研究,^④ 而远赴美国读书的哈佛研究学社的首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在那里显露头角。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用英文在西方汉学界发表文章,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被中国经济史专家胡寄窗认为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名著, 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科学论著中的最早一部。”^⑤ 此间德国在北京的汉学家有几十人之多,^⑥ 著名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在北京诞生, 主编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对西方汉学已经十分熟悉,^⑦ 陈寅恪先生应英国牛津大学邀请担任汉学系教授, 因眼疾而未成。在这样

① 朱谦之此书于 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7 年、1999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 2002 年编入《朱谦之文集》之中。

② 《汉学发达史》2005 年出版, 2004 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重新组织在大象出版社出版, 李学勤先生为书写序, 序中说: “《汉学发达史》成为我走入汉学世界的向导。书的末了附有参考书举要, 我选择其中属于汉学史性质的集中, 按照出版次序, 从图书馆找来阅读。这些书其实都是日文的, 包括 1932 年的石田干之助《欧人的中国研究》、1933 年的后藤雄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的起源》(我还读了他的《中国文化西渐欧洲》), 1939 年的巴托(W. Barthold)的《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东方研究史》(日译本)、1940 年青木富太郎《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1942 年石田干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与《汉学发达史》相对照, 才了解莫东寅先生是以《欧美的中国研究》为主, 将上述各书内容贯通, 并参用了张星娘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材料。作为国内首创, 这本书功不可没。”

③ 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术交往录》, 浙江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

⑤ 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76 页。

⑥ 参阅[德]马汉茂、汉雅娜、[中]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 大象出版社;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 德国汉学之研究》, 外研社 2008 年版。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 文献与研究》, 外研社 2013 年版。

⑦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 尤其国学的发展已经和过去形态不同, 陈来将其称为“汉学之国学”, “汉学与国学正互相渗透与交叉。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学术对象, 注定可以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样两种天成的视角; 汉学是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 是研究中国的西学,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西学; 国学与汉学之间, 是相互依托、彼此交融和共同滋养的。三、‘汉学之国学’说, 认为汉学化的国学就是世界化的, 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厘清自身的‘身份’, 从纷繁的头绪中廓清国学面目, 构成国学汉学之辨的主题。国学的这种自觉也是在经历了多年所谓的国学热之后国学对自身身份的关照。”

文化交融之下，对汉学历史的研究是必然的。^①

就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言，民国初年在《岭南学报》上发表的谢扶雅的《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陈受颐的《鲁宾孙的中国文化观》、《〈好速传〉之最早的欧译》、《18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论文从中欧文化关系研究的方向，加深了这一领域的研究。^②方豪先生进一步开拓耶稣会来华研究的范围，成果引学界关注，其中来华耶稣会所开启的“中学西传”自然在其研究之中，他所写下了的《中国古代文化经籍西传欧洲史》则是较早研究这一方向的学术论文。^③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研究领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才开始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李学勤先生认为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先行阶段”、“翻译介绍阶段”、“新世纪阶段”。任大援先生将这三个阶段具体划分为：

第一阶段，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先行阶段，开始于“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下迄1987年。

第二阶段，汉学研究的翻译介绍与研究阶段。以1987年由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88年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标志，下迄2001年教育部、国家汉办、大象出版社、北外海外汉学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前。

汉学（中国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我们将其时段定在21世纪（新世纪）。从2001年“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这种划分虽然是这一领域三十年来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表达，但“新世纪”这一时间条件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一阶段，我们将其看做是“会通”与“超胜”的阶段。此阶段，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和深度都大大加强了。^④

学者开始在汉学（中国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几个领域接续民国研究的学术传统，重启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这一重大学术方向。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乐黛云先生编

① 关于民国期间学术界对国外汉学研究，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也可以参看马军的一系列论文索引，本书在以下的研究会多次引用到马军的研究成果。

② 参阅方豪的第一本书《天主教论丛》，胡适题词。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④ 任大援：《汲古得修绠 开源引万流：关于新时期汉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于李雪涛、柳若梅、顾钧编：《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外研社2010年版。

辑出版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1996年)、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在国外》(1990年)、人民出版社的《中学西渐丛书》(2006年),钱林森主编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跨文化丛书》(2004年)和上海书店的《走进中国文化译丛》(2006年),严绍璁主编了《北大比较文学丛书》,孟华出版了《伏尔泰与孔子》,吴泽霖出版了《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等等,三十年来沿着这样的思路,先后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①这些著作和译著主要侧重影响史研究,从各国对中国文化接受的角度展开学术的叙述,并由此开辟西方思想文化形成中的中国因素研究,大大扩展了传统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范围,展开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新的学术魅力。

由谢方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则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国际汉学书系》,经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十余年的经营,已经成为研究海外汉学史的最重要学术丛书。中华书局和大象的这两套书的价值在于都是立足于历史,梳理西方认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基本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奠基了中国学术界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这两套书与侧重当代西方中国学译著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学术丛书》形成两个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从而为学术界展示了历史与当代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基本面貌。^②

历史方面还有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的翻译出版,影响巨大;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988年)、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中华书局,1993年)、《西域游历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编译丛刊分别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国外清史研究的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史》(2007年)、三联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时洛阳纸贵。

这些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译丛,极大的开拓出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剑桥中国史》在业内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

在汉学史出版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辽宁教育出版

①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年版;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翻译上,立足基础文献翻译和立足当代最新研究著作的翻译,这两个视角形成互补。这显然比那些从二手材料编辑文献的著作的做法要扎实得多。参阅《国际汉学》第23期(大象出版社),笔者论文《在世界范围内梳理中国文化外传的历程》,文中详细介绍了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版《西方汉学经典译丛》的学术意义。

社, 1997 年)、《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8 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时事出版社, 1998 年)、《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发现中国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大航海时代丛书》(东方出版社, 2000 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8 种》(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0 年)、《西域游历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西方发现中国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年)、《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年)、《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中华书局, 2005 年)、阎存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 2007 年)、朱政惠主编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等。^① 这些丛书和著作的先后问世, 大大加深了对各国汉学史的了解, 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传播深度的认识。

实际上对西方汉学名著的翻译已经不仅仅为研究海外汉学史的学者所关注, 这些著作更成为新时期更新学术观念和史料进展的重要推进器, 这里只要提一下夏志清的《中国文学史》一书的翻译, 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和耿生先生的法国汉学名著的系列翻译出版对学术界西域研究、西藏研究的影响就可以看到, 海外汉学名著翻译出版与当代中国学术进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交错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作已经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发生内在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翻译史研究在近十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长期以来以研究西学东渐为主的中国翻译史领域, 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学西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译的专著, 这是令人高兴的事。^②

① 任大援:《汲古得修绋 开源引万流: 关于新时期汉学的回顾与思考》, 载于李雪涛、柳若梅、顾钧编:《跨越东西方的思考: 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外研社 2010 年版。

② 李明滨:《近代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上下篇)》, 载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与翻译学建设十大问题》, 载于《民族翻译》2008 年第 1 期;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概念、理论与技巧》, 载于《大连外语学院学报》2001 年第一期; 王宁:《‘世界文学’: 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 载于《探索与争鸣》2010 年第 7 期; 刘立胜、廖志勤:《国学典籍翻译主体选择与译者能力培养研究》, 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11 年第 10 期。陈友冰:《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及学术特征》, 载于(台湾)《人文与社会》学报第一卷, 2007 年第 10 期; 周领顺:《由“锦瑟”看模糊汉诗的英译——兼及 J. 刘若愚译论》, 载于《外语教学第 20 卷》1999 年第 3 期(总第 81 期);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五卷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许钧、朱玉彬:《中国翻译史研究及其方法初探——兼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 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7 年 11 月。相关论文和著作还很多, 不再在这里一一列举, 在本书的研究中会在具体章节中介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进展。

以上这些成果和学术进展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历史及其学术影响和学术意义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同时,在对这个研究领域的自我认识和学术理解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严绍璦先生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域外汉学研究做了十分完整的分析与总结,他认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基本学术定位应是“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则是中国的人之学术,诸列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法律、宗教、考古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即这一学术的本身,它的研究和它的成果,自然都可以而且也应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的相应学科之中。”^①这说明了,域外的汉学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学术中的一个部分,它的存在扩展了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围,由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问。

就对域外汉学(中国学)展开研究的内容而言,严先生讲了四点:

“第一层面的内容,则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文化的传递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有人种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现代有电子传媒。”

“第二层面的内容,则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在传入对象国之后,于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伏态。”

“第三层面的内容,则需要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念’。”

“第四层面的内容,则需要研究和掌握各国‘Sinology’中在它自身发展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并由此而研究并掌握各个国家的‘Sinology’的学术谱系。”^②

严先生这四点完整的概括了展开域外汉学(中国学)学术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个概括不仅理清了国学与汉学的关系,同时,也从知识与跨文化的角度说明汉学在世界各国所发展存在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从而纠正了那种单一套用后现代理论解释西方汉学的知识特征和思想文化特征的混乱倾向。在学术研究中,认识的尖锐与新颖常常是因为片面;认识的圆周与圆融常常因为是全面。学术上的尖锐和新颖会一时名声噪起,而圆周和全面则长久而弥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千古恒理。

任大援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海外汉学研究时说:“通过这种回顾,可以使我们看到三十年来的成绩,也看到今后任重道远。展望今后的任务。我们想用

① 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② 同上,第557~562页。

以下16个字概括,即:‘整合成果、建立学科、培养人才、合作攻关’。”^①这是一个远大的设想,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构成本书的出发点。

二

本书就是沿着严绍璎先生的思路展开的一个尝试,只是将其重点放在“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这个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因课题所致,本书将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研究上,在研究范围上,因我们知识和能力所限,只能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世界部分国家的传播这个范围内,大体集中在东亚、东南亚、阿拉伯世界、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

如何按照这个确定的内容和范围展开研究,笔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史学方法问题。海外汉学(中国学)是一个涉及中国学术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准确地说,海外中国学属于多学科汇集的学科群,只要是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都可以包容在内,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地理学、生态学、国际关系学,如此等等。而事实上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由各分支学科落实推进的。各学科按照自己学科建设的路子深入研究之。”^②无论从哪个具体学科出发展开研究,历史学是其研究的基础,我们在展开中国古典文献在西方的传播历史研究时,也必须遵循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这种历史方法就是李学勤先生所说的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现代社会的学科分得很细,每一门学科都有相应的历史研究,如哲学有哲学史,数学有数学史,都是独立的学科分支。汉学这个学科也应该有对应的研究,这就是汉学史,或者叫作国际汉学研究。”“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③

① 任大援:《汲古得修绋 开源引万流:关于新时期汉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于李雪涛、柳若梅、顾钧编:《跨越东西方的思考:世界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外研社2010年版。

② 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于《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

③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部分国家的传播与发展，这是本书的基本做法。当下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的个案性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好的著作，但贯通性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无先例。

由此，本书实则是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之外译为内核，从一个侧面梳理域外汉学的历史沿革的尝试。如果从“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为通史”的原则来看，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外译传播的通史性著作，当然这只能是一部导论性的通史著作。通史写作其贵在“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再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再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之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成具之要义。”^① 这就是，贯通与脉络是写通史最为重要的。中国史学向来有通史、断史两种范式，但通常以治通史为主臬。何谓通史？自有不同理解。严耕望先生用方以智的话，提出“圆而神”，深为学术界所赞赏。“圆而神”就是在纵方向上要有一个贯通的体系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作为一部导论，笔者并不奢求能做到这一点，但将努力去做。

一人难有学贯中西、会通古今之本领，这是所有写通史人之难，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只能是一个导论性的著作，力求贯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部分国家翻译传播的历史，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通古今之变，在集中于20世纪的前提下，我们将努力概括出了中国古代经典外播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说明在海外汉学的发展史中，汉学家们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时，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的基本特点。贯通厘清脉络，概略而彰明意义，这是这本书在写作中的基本原则。

为使全书在保持一种“通古今之变”的追求，而又不失深入研究，笔者采取了横向地域性写法，分别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东亚的传播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播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美的传播历史、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英国的传播导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德国的传播导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法国的传播导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意大利的传播导论、中国古代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导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的传播导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的传播导论，通过从这些国家的研究入手，试图从对这些国家翻译中国典籍的研究中总结一些基本的规律与特点。

近代以来域外汉学成果引起国内学者之关注，源于西洋人治中国学问大多是

^① 金毓黻：《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0页。